



風起雲揚

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張伯偉 編

中華書局

風起雲揚

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張伯偉 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伯偉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9.10

ISBN 978 - 7 - 101 - 06857 - 3

I. 風… II. 張… III. 漢學 - 研究 - 學術會議 - 文集
IV. K207.8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14936 號

責任編輯:俞國林

風起雲揚
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張伯偉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50% 印張 · 120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600 冊 定價:36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857 - 3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二一一工程」「中國語言文學與民族文化復興」項目資助

歡迎詞

南京大學校長助理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

周 憲

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歡迎來到六朝古都南京！八月的南京剛度過了炎熱的夏季，進入怡人的秋天。在這美好的季節裏，我們迎來了參加本次會議的各位代表。在此，我謹代表南京大學對各位來賓、專家學者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南京大學歷來十分重視國際學術交流，與國際學術界有着廣泛而密切的交流與合作。于2000年成立了域外漢籍研究所，經過幾年的努力，已有相當的成果。南京大學以綜合性、研究型、國際化為目標，本次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對提高南京大學的國際影響力，創建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域外漢籍研究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在世界全球化日益明顯的今天，突破一國界限，在更廣泛的範圍內進行漢文化的研究，已經越來越有必要。東亞文化圈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域外漢籍的研究對東亞文化的建設有積極意義，其重要性已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極大關注。今天到會的嘉賓中，有多年致力於此項研究的專家學者，也有優秀的中青年學者。大家濟濟一堂，共同研討這一重大課題，必將產生優秀的研究成果，對促進這一學科的建設，促進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南京大學歡迎與會專家學者構建這樣一個平臺，以學術為紐帶，使不同的國家、地區增加交流、增進理解。我們希望這樣的研討會能夠經常舉辦，南京大學願意為這樣的學術交流提供盡可能多的幫助。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在這幾天裏，各位將會就對學術研究有重大意義的課題進行研討，交換意見和心得。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希望各位能在接下來的活動中，親身感受漢文化的魅力。

謝謝各位，再次歡迎大家的到來，衷心祝願大會圓滿成功！

開幕詞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

張伯偉

各位學者、各位來賓：早上好！

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經過將近一年時間的籌備，今天終於在中國古都南京開幕了。我謹代表本次大會組織委員會，向來自海內外的各位學者表示熱烈歡迎。

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曾經形成了一個漢文化圈，並且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留存下大量的漢籍。就國別而言，可以稱韓國漢籍、日本漢籍、越南漢籍等，相對於中國所存者而言，也可以統稱為域外漢籍。進入21世紀，域外漢籍的研究在東亞各地區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業績。正是為了推動域外漢籍研究事業的開展，檢閱近年來域外漢籍研究的最新成果，南京大學文學院、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以及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聯合舉辦了這次研討會。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學術研究的發展和進步往往得力於新資料的發現和運用，1938年，胡適在《近年來所發現有關中國歷史的新資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中，提到甲骨卜辭、燉煌卷子、大內檔案以及禁書逸書，同時也提到“日本朝鮮所存中國史料”。在上述新資料中，前四者都在20世紀學術研究中充當了重要角色，得到國內外學術界較為充分地認識和使用。而最後一方面的史料，在胡適的認識中，可能更多的還是指流失在日本朝鮮的中國史料，至於日本、朝鮮的漢籍以及其中所存的中國史料，其價值和意義尚未能得到學界的重視。21年前，臺灣聯合報國學文獻館發起組織了首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當時的普遍狀況是，學術界對於域外所存的漢籍資料多不曾注意，甚至是根本生疏的。20年來，隨著大批中國學者走出國門，域外漢籍的面目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其情形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在韓國和日本，隨著對本國文化傳統的深度了解和反省，對歷史上漢籍也越來越重視。本次大會所收到來自韓國、日本、美國以及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地區學者的數十篇論文，從各個方面和層面上對域外漢籍

展開研究，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象徵。

就近年來域外漢籍研究的發展而言，我想在這裏作一個大膽的判斷：域外漢籍研究是本世紀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其價值和意義完全可以和上世紀的新學問——燉煌學作類比，甚至有以過之。爲甚麼？說到一門學問的成立，它應當滿足若干基本條件，大致說來有，1、具備獨特而豐富的資料來源；2、能夠不斷提出新的命題並產生新的理論和方法；3、擁有相對穩定的研究隊伍和卓越的研究成果。域外漢籍就是這樣一批獨特而豐富的文獻，即便現在我們還沒有編出域外漢籍總目，但是僅僅從韓國、日本和越南的各類現存書目中，我們已經能夠確認，域外漢籍是一個龐大的資料寶藏。而學術界已經提出的若干新命題和新設想，比如“漢文化整體研究”、“書籍之路”、“俗文本文獻學”以及更爲細化的“文學典籍的流傳”、“文學人士的交往”、“文學讀本的演變”、“文學觀念的滲透”、“文學典範的確立”等，也顯示出這一領域的蓬勃的生命力。而以綜合的方法從事域外漢籍研究，對歷史上的汉字文獻賦予一個整體的意義，我們的眼光自然就能超越國別的限制。我以爲，今天從事域外漢籍研究，應該突破傳統史家“天下一統”或“中心—四裔”的觀念，溝通中心和邊緣，追尋對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和體驗。這樣，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止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止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其對漢文化整體的理解和認識，絕非無關宏旨或無足輕重。漢文化在歷史上曾發揮偉大的作用，它已經成爲東亞各國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發這種因素，闡釋其價值和意義，使漢文化在21世紀世界中發揮更爲積極的作用，正是今日學者從事域外漢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1930年，在燉煌莫高窟被發現二十多年後，40歲的陳寅恪對當時的新學問有過一段著名的論述，我特別想在這裏誦讀一遍，獻給在座有志於獻身學術的年輕學子：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總之，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著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和熱情推入其中。

祝大會圓滿成功！

祝各位代表在南京期間心情愉快！身體健康！

祝 詞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顧問

戶川芳郎

近年我接受了兩個顧問之銜，一個是北京大學“儒藏”編纂委員會顧問，另一個不用說就是擔任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顧問。我接受域外漢籍研究所顧問的原因甚為明瞭，因為研究所以“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為學風特色，秉持文獻學為基本的研究方法。

宣言以文獻學的方法為設立宗旨，我想就此略陳己見。日本的近代學術，特别是人文學所顯示的特色，有着採用東洋學、支那學這種傳統研究方法的劃分，並以學會的形式延續至今。東洋學有東方學會，支那學（漢學）有日本中國學會，是各具六十年光榮歷史的全國學會。我與它們一直有着深切的關係，並承擔理事長之職。

毋庸贅言，一百三十年來，在具有近代學術特色的兩學會中，日本中國學會其學問在日本的形成，頗為曲折。

中國學，乃支那學（Sinology，漢學）、中國古典學之謂。日本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即貴研究所倡導的“文獻學”、文獻實證學，也就是清朝漢學——乾嘉之學（戴、段、二王的揚州學派）——俞樾、章炳麟，係以清朝朴學為代表的學問取向。日本的支那學（Sinology）是對這一學問取向的自覺受容。

狩野直喜（1868—1947）與內藤湖南聯手，在新設的京都大學文科裏所營造的學風，惟有上述之支那學，即文獻學——目錄、訓詁、校勘、辨疑之學。狩野氏門下，小島祐馬、青木正兒、武內義雄等才俊輩出，關門弟子中，則以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為個中翹楚。

我在東大、京大曾受教于倉石、吉川兩先生，故有作為狩野氏直系弟子的自覺，從而得到清朝學術忠實繼承者之評價。兩先生一同留學北京（1929—1931），其間曾分別訪問過南京，拜訪過黃侃（季剛）先生，皆感慨其學問之精深。從倉石先生那裏聽到過黃侃先生關於《穀梁音義》為宋人改竄的判斷，黃侃先生的說明懸河瀉水，足見其學問之精湛。

南京大學自黃侃先生始，傳承了有氣骨的學風。

日本戰敗後，中國學會繼承發展了支那學（中國古典學、漢學）的方向。我所說的大家覺得現在已頗為陳舊，但支那學（sinology）被譯作“日本漢學”（nihonkangaku），帶着漢學(kangaku)語意本身的模糊性過了數十年，反而令人有不無遺憾之感。

漢學（Sinology）向來是法國漢學與美國漢學並稱，同時有朝鮮漢學、日本漢學之稱，但所謂日本漢學，指的是江戶末明治期的漢學(kangaku)、室町江戶初期的抄物（shomono）研究等，非指現在中國學會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古典學研究。

貴研究所的“域外漢籍”也同樣，我以為可理解為中國傳來的版印本、寫本與和刻本、日本鈔本（包括帶和訓、夾雜假名類書籍）的廣義文籍的總稱。

不過，儘管其名稱頗為曖昧，此次卻召開真正的文獻研究研討會，廣泛地研究討論“域外漢籍”，使當今的研究水準得以一一展示，我為此深受感動。

在此，我謹向準備本次會議的張伯偉所長諸位以及支持域外漢籍研究的南京大學表示感謝，並致以問候！

（俞士玲譯 金程宇校）

目 錄

歡迎詞·····	周 憲 (1)
開幕詞·····	張伯偉 (2)
祝詞·····	戶川芳郎 (4)

漢籍綜合研究

中古時代中朝的雙語字典編纂傳統·····	劉迎勝 (3)
《文筌》的朝鮮本、和刻本的版本及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李長波 (36)
獨往性幽與《蟄聲詩集》：黃檗宗與復明運動的一個側面·····	廖肇亨 (73)
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	張伯偉 (85)
關於朝鮮後期文人的《虞初新志》閱讀與其接受·····	金榮鎮 (121)
試論桐城派文論在明治漢學界的影響·····	陶德民 (143)
麻六甲印刷所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的史地漢文文獻·····	鄒振環 (152)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李奎報《東國諸賢書訣評論序并贊》小議·····	馮翠兒 (173)
從《高麗史》的編印看鮮初史學·····	王小盾 (195)
《燕行錄全集》考訂·····	左 江 (227)
論李退溪的圖說觀及其學術淵源 ——以圖式與義理的關係為中心·····	吳正嵐 (253)

- 關於《朱子語類》尤菴宋時烈作成“小分”……………趙鍾業(282)
- 明末中國典籍誤題蘭雪軒詩及其原因考論……………俞士玲(284)
- 類比之風與主流意識
- 許蘭雪軒詩歌新論……………張宏生(322)
- 《東廂記》之體裁與其含義……………李昌淑(336)
- 崔理煥《性靈集》考……………琴知雅(348)
- 冷齋柳得恭的“時調漢譯”與其意義……………金允朝(363)
- 韓國漢文笑話集《破睡椎》初探……………王國良(373)

日本漢籍研究

- 《文鏡秘府論》卷次考……………盧盛江(395)
- 日本傳存的唐尚齒會詩斷簡……………後藤昭雄(402)
- 《參天台五臺山記》研究史綜述……………郭萬平(406)
- 清代帆船漂到日本之筆談史料……………松浦章(414)
- 清朝中國商船船員之日本觀
- 以漂流史料為中心……………張新藝(426)
- 角田簡之《世說》仿作初探……………錢南秀(437)
- 試論日本漢詩的模仿與創新……………徐有富(457)

越南漢籍研究

- 越南文獻與碑誌資料中的李常傑……………耿慧玲(469)
- 《大越國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齡塔碑》校考……………程章燦(485)
- 從敦煌和越南的民間文本看“俗文本文獻學”的建立……………劉玉琚(510)

漢籍交流研究

- 關於興福寺藏《經典釋文》以及《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河野貴美子(531)
- 王粲《登樓賦》及其對文學史的意義……………曹虹(548)
- 《太公家教》流傳考……………山崎誠(559)
- 關於敦煌文書(P2610)中風角關聯條的一個考察
- 參考《天地瑞祥志》等與風角有關的類目……………水口幹記(578)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廬山復教集》和《廬山蓮宗寶鑑》

- 與高麗時期傳入的白蓮宗……………朴現圭 (590)
- “北宋本”《新雕入篆說文正字》考……………李慶 (599)
- 朝鮮活字本李壁注《王荆文公詩》之文獻研究……………卞東波 (608)
- 佚存東瀛的方岳詩文集及其價值……………金程宇 (626)
- 明代笑話《絕纓三笑》與朝鮮刊本《鍾離葫蘆》……………崔溶澈 (638)
- 越南漢文小說《花園奇遇集》與明代中篇傳奇小說……………陳益源 李淑如 (644)
- 日本所見湯顯祖戲曲版本綜錄……………黃仕忠 (652)
- 《櫻花館日本詩話》書後……………張寅彭 (669)
- 《增訂叢書舉要》日本書目識小……………陳鴻圖 (672)
- 京都大學所藏的承培元《籀雅》小識……………文映霞 黃耀堃 (683)
- 傅雲龍《游歷日本圖經》徵引文獻考……………王寶平 (693)
- 論中日漢籍的古今交流……………黃仁生 (705)

文士交往研究

- 壬辰倭亂和韓中文士的文化交流……………鄭珉 (719)
- 明遺民張斐軼事輯考……………劉玉才 (723)
- 玉溝春水鴨江波
- 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清國文士交往研究……………徐雁平 (734)
- 關於明治初期東本願寺布教僧的日中文化交流
- 以松本白華、北方心泉爲例……………町泉壽郎 川邊雄大 (764)
- 葉焯與日本漢詩……………蔡毅 (770)

會議側記

-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研討會”參加記……………水口幹記 (781)
- 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河野貴美子 (783)

- 作者名單…………… (788)

漢籍綜合研究

中古時代中朝的雙語字典編纂傳統

劉迎勝

偶而見得一本書《雙語辭典學導論》(修訂本)^①。該書從雙語辭典的編寫史、類型、特殊性、宏觀與微觀結構、語文性與非語文性、語言的差異、翻譯、成語的編排與處理、術語與多語辭典等部分,研究了各種雙語辭典。筆者近年來一直關注明四夷館、會同館所編《華夷譯語》,與朝鮮司譯院的譯學所編對譯分類字書,因而對有關雙語字典的研究產生興趣。閱讀此書後發現,書中許多部分對筆者的工作有極大啟發。惟對作者有關雙語字典編寫史的論述有些疑問,故將筆者隨想記錄如下,以期拋磚引玉。

一、《雙語字典研究》作者眼中所見雙語字典的編寫史

從目前學界發表研究的成果看,關注雙語字典編纂史的主要是當代外語教學界編寫西方語言—漢語字典的學者。當代西方語言—漢語字典內容信息量大、種類多、更新快。因此這些學者關注的問題緊扣當代國際雙語字典編纂界的學術主流,其成果有很强的現實意義。也許是因為長期從事具體某類字典編寫工作,以及這些學者的學術背景主要是西語字典編纂學的原因,其目光大致限於西方,有關中國的學術傳統知識卻嚴重不足。舉例來說,《雙語辭典學導論》(修訂本)的作者黃建華、陳楚祥在其書導言中有關雙語字典編纂史其要點如下:

- 1) 古希臘人對編寫希臘—周邊蠻族對照字彙表不感興趣。
- 2) 古羅馬人約從6世紀起開始編寫雙語字彙集,最初編寫的是拉丁—希臘或希臘—

^①黃建華、陳楚祥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版,第二次印本。

拉丁語字彙集^①。

- 3) 近東與美索不達米亞的情況因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暫置不論。
- 4) 中世紀西歐出現雙語現象：社會上層使用拉丁語，而各地平民則通行各種地方語言（英、法、德、俄語等^②）。最初是在拉丁文宗教著作的字裏行間加注淺顯的拉丁文或其他當地語言注釋，後來出現拉丁語與其他語言字彙表。西方專門研究者所掌握的不過20餘種，多編於8—11世紀之間。字數多數為1000餘字。^③
- 5) 14—15世紀為西方雙語辭書的成形期：
 - (1) 從以古語辭彙作詞目逐漸過渡到古今語並重。
 - (2) 從以拉丁語為一方，逐漸擴展到雙語均為當時的活語言。
 - (3) 字書的收詞量大增。
 - (4) 排序從義序走向形序^④。
 - (6) 進入文藝復興時代以後，雙語詞典蓬勃發展起來。

原作者指出：

“至於中國辭書史專著，我國已出了四五種，卻尚未見雙語辭典史的專著，散見於報刊的某些有關文章雖然有重大參考價值，但仍不足以據此與西方雙語詞典的發展作認真、全面的對比”。原作者雖然坦承“還不具備深入發掘我國雙語詞典發展史料的條件”，但又同時斷言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卻有很大的不同。中國長期以來是個中央大帝國，對鄰近各民族往往採取同而化之的態度，而且秦代開始便實行書同文，各地也不大採用拼音文字，雙語詞典的需求自然不象西方那樣迫切”^⑤。

①作者所據為亨利·貝熱萬與菲力浦·特瓦榮1996年所出《雙語辭典》一書（Henri Béjoint/Philippe Thoiron, Les dictionnaires bilingues, Aupelf-Uref-Editions Duclot, 1996, 頁22），此據《雙語辭典學導論》，頁2及頁225。看來作者在這一點上並沒有自己獨立的研究，只是因為編字典涉及體例與理論問題時，參考過他人著作而已。查黃建華、陳楚祥從未發表過有關古代近東文明、其地古文字與語言的研究論文，因此關於該地區古代雙語字典編寫傳統問題，作者所缺者恐怕不是什麼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問題，而是在該領域的研究能力問題。

②原作者黃建華、陳楚祥此處行文邏輯上有問題，俄語並不通行於西歐。

③原作者黃建華、陳楚祥所據為法國學者馬托雷的《法語字典史》（G. Matoré, Histoire des dictionnaires français, Paris, Larousse, 1968）。此據《雙語辭典學導論》，頁2及頁225。

④《雙語辭典學導論》，頁4—9。

⑤《雙語辭典學導論》，頁12，並見同頁注2。

此說不對。中國雙語詞典的編寫歷史要早於上述兩位學者基於外國學者研究所了解到的拉丁語—希臘語或希臘語—拉丁語字彙表出現的時間。

當然黃建華與陳楚祥也指出，“就狹義的當代雙語詞典而言，我國並不落後於西方之後，好幾本‘少數民族語—漢語’詞典都成書極早。例如，按《爾雅》譯成‘番書’（西夏文）的《番爾雅》，是一部分類排列的雙語詞典，成書於1032—1048年之間。作為西夏文—漢文詞典的《蕃漢合時掌中珠》則於1190年問世。《華夷譯語》（或稱《蒙古譯語》，與後來四夷館編纂的《華夷譯語》有所區別），實際上是部蒙古語—漢語詞典，也於1382年成書。……換而言之，中國的活語雙語詞典史比西方要悠久得多。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涉及的語種眾多，明代四夷館的《華夷譯語》就包含近二十種語文^①，舉凡中國的各民族語言，幾乎無不涉及^②。在這方面與西方相比也毫不遜色”^③。上述描述基本近於事實，雖然大體沿續他們參見的陳炳迺的論文，還存在一些錯誤，但畢竟提及了中國古代編纂雙語歷史的大致歷史。

黃建華、陳楚祥先生所參考過的有關我國雙語詞典編纂史的論文有：

- 1) 黎難秋：《中國雙語詞典史話》，《辭書研究》，1982年，第1輯。
- 2) 陳炳迺：《我國民族語言對照詞典簡史》，《辭書研究》，1982年，第1輯。
- 3) 陸升：《雙語語文詞典的歷史、現狀和前景》，《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④

其中黎難秋的《中國雙語詞典史話》循佛經翻譯、明四夷館、明中期以後西方傳教士入華、清四譯館與會同館、清末同文館的綫索論述了雙語辭典的編纂工作。但黎難秋沒有對上述綫索的幾個階段作細部研究。

黃建華、陳楚祥所參照的陳炳迺的《我國民族語言對照詞典簡史》一文，是一篇認真之作。作者回顧了佛經翻譯的背景，從宋鄭樵《通志》中提及的《釋梵語》（一卷，不著作者和年代）開始敘述。梵語並非我國的少數民族語言，所以作者講述的內容超越了民族語

①此說不確。四夷館本“華夷譯語”起初包括八種語文，後擴至十種。除四夷館編寫雙語字典外，會同館也編。

②“華夷譯語”不僅包括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漢語字彙表，也包括周邊國家民族的語言—漢語的字彙表。

③《雙語辭典學導論》，頁13—14。

④這三篇論文中，筆者請博士生舒健按圖索驥，但只找到前兩篇，未能查到陸升的文章。或許黃建華、陳楚祥兩位原作者提供的資訊有誤。希望將來能有所發現。